

论三线建设与四川经济跨越式发展

宁志一¹

【摘要】三线建设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论述了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及资源优势成为党中央考虑经济战略纵深配置的首选省,强调了第一代领导人决策三线既有备战的因素,也有改变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文章阐述了以三线建设为契机,四川的现代化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以及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对三线企业的挑战和给三线企业带来的机遇。

【关键词】三线建设;四川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0)04—0018—7

三线建设是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期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布局的一次重大调整。这次工业布局的重大调整,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给内陆大省四川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三线建设使四川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一、三线决策的特殊性使四川成为经济战略纵深配置的首选省

五六十年代,中国是在和平中进行经济建设的,但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美国不断对中国进行的武力威胁使中国最高决策层战争之弦绷得很紧。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离不开考察毛泽东对战争问题的思考。中国地域辽阔,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布局也跟备战密切相关。

朝鲜战争结束后,尽管毛泽东估计大战有可能避免,但国际冷战局势和中美军事对峙,中国仍然做对美作战的长远准备。50年代后期,虽然也准备应付战争,但更多地是注意工业的投入产出问题,国家的投资也兼顾了见效快、效益高的沿海地区。

60年代以来,中国的周边环境扑朔迷离,令人不安。在北部和西部,随着中苏关系由争执发展为战略对峙,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其战略导弹也指向我国的重要设施。在东南沿海,美国一直占据台湾海峡并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袭扰大陆。在西南方向,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地区在发生印军入侵和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之后,双方互存戒备,战争状态并未消除。在东北方向,美国驻兵南朝鲜和日本,对中国和远东和平构成威胁。到1964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美国悍然越界轰炸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将战火迫近到中国的南大门。

当时中国工业布局,从军事经济学角度看,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几乎全在苏联轰炸机一个小时航程和中短程地地导弹射程之内,反应时间短,防御能力差;以上海为中枢的华东工业区全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和以台湾为基地的航空兵的攻击之下。这种状况不可能不引起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注意。总参谋部对

(本文作者:1956年4月生,云南宣威人,1982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学校历史系,现为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主要学术成果:参与编撰(任主编、副主编)《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中共四川历史专题纪事》(社会主义时期);在《毛泽东思想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等刊物发表《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的起步》、《论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等论文40余篇成都610012)

我国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1964年4月提出一份报告,分析了我国工业过分集中,大城市人口多,主要铁路、桥梁、港口、水库易遭袭击等严重情况。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①表现出毛泽东对这件事的急切心情。毛泽东当时还研究了苏联工业化的特点。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和严密封锁下,在发展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同时,把工业的重心从欧洲部分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大城市转移到乌拉尔以东的西伯利亚腹地。斯大林的重工业战略及其工业重心的东移,为后来战胜法西斯奠定了实力基础。

国际局势的动荡,战争的威胁,苏联工业化的示范效应,使毛泽东重新考虑中国的工业布局问题,决心进行中国工业的战略纵深配置。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1964年下半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建立了从国务院、西南局、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到各省的指挥系统。有着极强备战色彩的三线建设正式展开。

建设三线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点,而三线建设的重点又在西南地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指出:“我们整个工业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所谓后方,一个是西南,一个是西北,现在最靠得住的还是西南。”^②四川作为西南大省,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有独特的优势。四川地处中国内陆腹地,面积57万平方公里,这里山屏岭塞,蜀道难于上青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对四川始终鞭长莫及。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更是举世闻名的战略大后方。四川有700多万人口,劳动力资源丰富。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交通条件由于成渝、宝成铁路的通车已有较大改善。“一五”、“二五”期间,国家已在四川安排了一些大型骨干项目的建设。四川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丰富,尤其是四川西南部丛山峻岭中还有蕴藏量丰富的钒钛磁铁矿,并且水、煤资源具备,有较好的开发条件和建设前景。从社会经济调整的状况来看,经过1962年以来国民经济的调整,四川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客观上也有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要求。因此,中国的大西南,特别是其中的四川,很自然地被列为建设战略后方基地较理想的选择地区。

中央要求用几年时间,在四川建设起国防科技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燃料动力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等基地;还要修筑成昆、襄渝等铁路干线。按当时的说法是:一线有的东西,三线地区基本上都要有;全国有两套的,要摆一套在三线;全国只有一套的“独生子”,应当摆在三线;今后新建的重要项目主要摆在三线。建设好以四川为重心的西南大三线,一旦发生战争,当中国东北和华东工业基地遭到帝国主义的空袭破坏后,完全可以凭借新建的工业基地,独立支撑战争。

二、三线决策体现了第一代领导人改变西南经济落后面貌的历史贵任戒

三线建设的决策过程也是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程。1964年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已经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5月10日、11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的插话中谈的主要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也还没有提到三线建设问题。此时严酷的国际局势,中国工业布局的弱点,使毛泽东迅速作出进行三线建设的决断。在5月15日至6月17日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话,谈的主要是三线建设问题,并在中央决策层达成了共识。此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主要是围绕三线建设来进行。

① 《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4页。
② 《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第21页。

中央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放在三线地区。但备战也不是建设大三线的唯一因素。1964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走出低谷,加大刘.中西部地区投入的条件已经具备。从中国经济建设更长远来考虑,此时也需要对三线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周恩来指出“我们第三线是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设不可。建设需要时间,如果第三个五年计划还不赶上去,还不逐步地建设起来,那么第四个、第五个五年计划就要落后了。”^①三线建设一方面是备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工业布局的大调整,在中国西北、西南掀起一轮工业建设的高潮,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水平。这对于改变我国旧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促进内地经济的全面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

当时的国际环境的确存在帝国主义入侵的现实威胁,但战争是否会爆发主动权在帝国主义手中。中央决策层中,并不是认为战争就一定能打起来,而是未雨绸缪,为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作准备。同时对战争打不起来的估计也很充分。毛泽东说:“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等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一定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你没有建设起来它就打,也可能你建设起来了它又不打。所以我们要有两手准备。”^②仗打不起来,三线建设是不是浪费?毛泽东考虑过这个问题。1965年1月12日在天津,毛泽东与部分高级干部谈话时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众人回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③毛泽东表示满意。毛泽东认为进行三线建设是备战的需要,但即使战争不爆发,从调整生产力布局的角度来看也是值得的。这样备战和开发建设西南和西昌地区就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通过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反复论证过程,我们更可以看到第一代领导人改变西南经济落后面貌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求实精神。

早在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肯定了国家计委开发攀枝花资源的规划。据勘测,攀枝花及其周边地区钒钛磁铁矿总储量超过50亿吨,对于铁矿资源较少,品位普遍比较低下的中国来说,攀矿的发现,不啻平地一声春雷。钢的成份里加入钒后,钢质更紧密,其韧性、强度和耐腐蚀性都能大大提高,钛金属具有比重小,强度高,耐高温,抗腐蚀性强等特点。尤其攀枝花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这里地处西南边陲,北接西南内地,南通祖国南大门,有丛山峻岭环护。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确定了这里具有其他任何地方都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1964年5、6月召开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讨论“三五”计划的工作会议,是一次在四川现代化建设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在会上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对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发表了看法。毛泽东说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毛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泽东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这一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刘少奇说,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耽搁了时间,将来不利。主席着重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重点是攀枝花。周恩来也说:“现在要把攀枝花作为一个中心,其他很多相应的东西都要搞起来。不当是一个攀枝花的问题,要通过攀枝花把云贵川联系起来。”^④

党中央的决心,很快变成了具体的行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周恩来总理便亲自出面指挥,指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和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具体负责攀枝花的开发建设。西南局和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召开了以攀枝花开发建设为中心的西南三线建设长远规划会议,规划将攀枝花建成

① 《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巧页。

② 《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41页。

③ 同上书,第47页。

④ 《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第20页。

以冶金工业为主体,煤炭、电力、建材、化工等综合配套发展的大型钢铁基地。会议决定组织联合工作组,对建设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建设成昆铁路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形成了攀枝花钢铁厂的选址问题和成昆铁路的建设原则。并向周恩来和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攀枝花调查和厂址选择情况。周恩来和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厂址初定弄弄坪。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召见李富春、薄一波、程子华,进一步详细了解西南(线建设规划情况。程子华详细介绍了攀枝花工业基地总体布局、重庆兵器工业配套、弄弄坪建厂规划,以及区内煤、电平衡发展情况,得到毛泽东赞同。李富春详细介绍了多次踏寻,选择厂址情况。毛泽东肯定了首选弄弄坪钢铁厂方案的合理,由此弄弄坪建厂方案得到最后确定。

196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西南局“关于成立攀枝花工业区人民政府”的报告,下达了《关于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的批复》,规定攀枝花人民委员会仿效大庆形式,实行政企合一,受冶金部和四川省双重领导。1965年3月4日,毛泽东主席审阅了冶金部长吕东、攀枝花特区总指挥徐驰所送的《加强攀枝花工业区建设的报告》,步批示:“此件很好”,攀枝花开发建设自此大规模展开。毛泽东主席的“三·四”批示,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成为建设攀枝花工业区的巨大动力。攀枝花人将3月4日这一天定为攀枝花建市纪念日而载人史册。

党中央决策层如此关注一个企业的兴建在新中国建设史上是少有的。50年代,中国不仅钢铁产量低,而且大多数集中在沿海和东北一隅,沿海和东北地区的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5%。而西南地区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钢铁工业基础却很差,钢产量只占全国总产量的3.8%。党中央如此重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无疑是想通过缓解西南钢铁的短缺状况,从根本上达到振兴西南地区经济的目的。

三、三线建设使川的经济得到了超常的发展

改变中国工业布局东重西轻的状况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战略目标,而达到这一目标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渐进的方式,即在发挥东部经济优势的基础上,逐渐加大对西部的投入,但改变西部经济的落后状况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另一种方式是突进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东部的发展,而国家在短时间内集中人、财、物迅速完成对西部的投入。三线建设就是后一种方式。三线建设规划的目标是,要在中国纵深地区再建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仅以四川的情况看,通过从1949年起国家对四川持续十多年的大量投资,集中力量开发建设,的确给四川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强大的实力基础。

首先,已经建起了一个具有一定水平,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

四川1在全国属于欠发达的省份,因此四川进行现代化的任务更艰巨。四川作为一个大省,加快现代化的进程,对于国家的现代化也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三线建设头3年,国家大幅度地增加了对四川的基本建设投资。从1955年到1967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共71.15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即达“4.7亿元,占总额的93.7%,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国家预算内投资总额的14%,比1958年到1967年7年间国家在四川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还多。四川大三线建设头3年的重点,主要是“两基一线”,即: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及成昆铁路的建设。同时,按照总体部署的要求,国务院所属各部还有一大批从沿海和东北等地迁人四川的重要工厂、科研单位。拟在四川境内建设的航空、航天、船舶、电子、核工业的一些重要项目,大多数也都要在这一时期动工修建。经过国家累计达307.64亿元的连续投资之后,四川的工业生产能力终于有了飞跃性的增长。由于一大批工业企业的兴建以及天然气的开发,四川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三大电站成套设备生产基地之一,四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一,五大钢铁基地之一;机械工业,形成了重型矿山和工程机械制造、机床工具制造、汽车、仪器仪表、农业机械等较完整的体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三线建设还带动和促进了四川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大三线建设中兴建的许多工厂和企事业单位,都尽可能地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在人才配备方面,三线建设调集了全国一大批科技人才的精华。四川的国防科技人才数量占全国的比重很大,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全国一流的专家。先进的技术装备,雄厚的科技力量,是发展四川经济的重要优势。

其次,四少1的国防科技工业在中国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开展大三线建设之前,四川只有23个国防科技工业企业事业单位。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至1985年,共建成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研究院所及配套单位100多个。其中大中型企业占97%,拥有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国防科技工业的14%。分别来看,兵器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其规模约占全国1/4;航空工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10%以上,建成了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生产歼击机和歼击机发动机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了新的卫星发射中心,能够制造战略、战术导弹和运载工具及其地面设备;建成了适应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对国内几乎所有型号的飞机、导弹、火箭、卫星及部分风工程机械设备进行了几十万次的风洞试验。

总之,通过大三线建设,在四川初步形成了国防科技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人才、知识、技术密集,能够研制和生产多种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的综合科研与生产的重要基地。

第三,极大地改变了四川及整个西南地区钢铁工业的落后状况。

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是三线建设的龙头。攀钢厂址选在不通铁路、被高山峡谷大江大河封隔的荒蛮之地,而工期只有5年,困难之大显而易见。从1964年9月开始,建筑及交通、煤炭、电力建设队伍率先进入现场,初步实现了三通(通路、通电、通水),接着,由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承担的攀钢主要工程项目建设安装工作开始进行,大批建设队伍开始来到弄弄坪工地。经过建设者们精心设计,巧妙安排,搬移2.5亿立方米岩石,修建8座跨越金沙江等江河的大型拱桥,在仅有2.5平方公里的三个大台地上建成了后来年产钢250万吨的大钢城,吨钢面积仅1平方米,连日本最先进的沿海钢厂也自愧弗如,被国外冶金专家称为“象牙微雕钢城”。也是世界上唯一的高钒钛铁钢铁厂。

正是攀钢的建成投产,使得西南地区的钢产量在全国的比重由原来的3.8%上升到了12.5%,特别是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技术,突破了国外近百年来没有解决的普通大型高炉冶炼高钒型铁矿的技术难关,填补了钒产品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攀钢作为中国目前为止唯一有矿藏资源依托的大型钢铁企业,无论从中国西南经济的发展还是从中国国防战略来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交通落后的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变。

对外交通的不便长期制约着四川经济的发展。成昆、襄渝铁路的修建,使四川的交通落后状况得到了改变。成昆铁路的建设,堪称世界铁路史上最险恶最艰巨的工程之一。它全长2163公里,沿线地区富藏煤、铁、铜、钒(世界储量第一)、钛、森林木材、水力,沿线也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成昆铁路的修建直接原因是建设攀钢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建设这样一条铁路大干线对于改变大西南交通落后状况,促进沿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70年7月1日伟大的成昆线终于建成。工程造价36亿元。襄渝铁路的建设,是70年代初四川三线建设中的一件大事。由湖北襄樊至四川重庆的襄渝铁路全长915公里,1973年全线通车,这条铁路之艰巨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也是罕见的。成昆、襄渝两条铁路的建成,使四川有5条大动脉(宝成、川黔、成昆、襄渝铁路和长江)与全国相连。

第五,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四川大地上迅速崛起。

三线企业相当一部分远离城市,分散在边远的山区。这些企业落户后,给这些地区带来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扩大了商品市场。而四川一大批新兴工业城市无一不是以三线企业为强大的后盾。正是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成在昔日的蛮荒之地崛起了一座崭新的工业城市攀枝花以长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首的产业体系的带动,绵阳已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发展为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大城市;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的西昌以“中国航天城”而闻名中外;德阳、广元、自贡、乐山等城市也由于三线企业的建立而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四、三线企业在折的历史条件下的机遇与挑战

三线建设时期,重点发展国防科技工业,适当地多发展一些重工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要求。但大三线建设开始后投资结构过于偏重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从而造成了农业、轻工业长期落后,与重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局面。由于片面强调“山、散、洞”的建设方针,一些单位进山太深,内部布局过散,远离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信息不灵,给生产科技协作和职工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另外,为了争时间、抢速度,三线建设许多工程质量很差,给投产带来了困难。

解决三线建设遗留的问题,早在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国防科委曾根据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进行调整b国务院对三线企事业单位提出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随后,在成都成立了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主要是对一些钻山太深、布局过散、厂址存在严重问题,或无产品方向,生产无法维持下去的企业,分别采取三种办法进行调整:一是就地改善条件,就地调整产品方向。二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科研院、所,到中心城市建立技术开发部。三是在原址无法生存的企业,采取迁并或迁建的办法,依托中心城市。

而使三线企业遗留问题得到真正解决,是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后。进入80年代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小平鲜明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他说:“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是很迫近的看法”,“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①中国将由准备应付大规模战争转向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在国防战略方面将走与过去不同的精兵之路。国家战略的转变,导致了三线军工企业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因此三线企业所面临的就不仅是一个搬迁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整个经营机制的转换。

大三线的建设,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市场经济中,如何生存和发展,成为大批三线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市场经济使四川的三线企业受到严峻的挑战,但市场经济也使三线企业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许多企业抓住机遇,使自身的实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如果说80年代以前三线建设为四川的现代化打下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的话,那么可以说,80年代以后,那些规模宏大,装备精良,人才济济的三线项目终于发挥出了它们应有的巨大作用。

三线建设期间四川建成了一批代表国家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航天工业骨干企业。这些企业在继续承担国防任务的同时大踏步地走向国际市场。坐落在四川省西昌市的中国卫星发射中心,1984年发射的第一颗试验通讯卫星准确进入太空同步定点轨道。1986年,这个中心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实用通讯广播卫星,标志着中国卫星发射从此由试验阶段进入实用阶段。1990年4月10日,当我国首次承揽的国际商用卫星“亚洲一号”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

发射成功后,邓小平立即打电话表示祝贺和慰问。进入90年代,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又多次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中标,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实力。

绵阳是中国西部重要,的电子工业基地,一批三线电子工业企业建在这里。到了80年代,军品任务大幅度减少,这些企业才真正感受到了现实的严峻。绵阳市委、市政府解放思想,不等不靠,积极引导这些企业走军转民、军地结合,共谋发展之路。并鼓励这些企业到市场中找项目,到市场中找效益。从1985年到1997年,全市共有军转民项目近200项,还开发出彩电、音响、传真机、电视天线、医用B超、光纤通讯等540多种电子工业产品。长虹公司原为一家生产军用雷达的企业,十多年来这家企业以彩电为拳头产品,一次次地抓住了市场机遇,一跃而为中国彩电大王、全国最大彩电生产基地、全国军转民“十佳”企业。长虹以产业报国,振兴民族工业创造了辉煌的业绩:1997年彩电产量达680万台,国内市场份额达35%,实现销售收入187亿元,品牌价值达182亿元。正是一批长虹这样有强大实力的企业作后盾,绵阳这座当年默默无闻的小城,正以新兴现代化大城市的雄姿屹立在中国的西部。

进入90年代,一批三线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有的企业充分运用资本市场、证券市场来发展壮大自己。四川的三线企业四川长虹、东方电机、东方锅炉、天兴仪表、攀枝花钢铁、长城钢铁等企业成功地在沪、深股市上市,在证券市场上筹集到了宝贵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四川长虹以其良好的业绩,不仅给广大投资人以高额的回报,而且成为上海股市中流通市值最大的一支指标股。三线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成功运作,也充分说明三线企业能够凭自己雄厚的实力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

90年代后,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三线企业的改革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江泽民1993年4月夕日题词“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既是对三线建设历史功绩的肯定,也对兰线企业的未来寄以厚望。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中央领导多次考察四川三线企业。1991年4月江总书记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并题词:“努力把攀钢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钢铁钒钛基地”。他来到待批的二滩水电工地上,听完汇报后说:“到工地来看一看大不一样,国家计委的同志也应该来看一看。二滩这个项目在中央没有不一致的意见。这个项目效益这么大,四川又已投入了4个亿”。并指示说:“你们一方面积极地干,另一方面积极地争取贷款,这是对的!”^{5①}在总书记的关注下,国家正式批准开工建设。1999年4月,江总书记又一次考察了四川的三线企业。在成都飞机公司,江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国防实力。他指出我们不搞实力政策,但必须要有实力。在长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书记表扬了公司在军转民方面作出的巨大成就。在攀枝花钢铁公司,总书记来到冷轧厂视察了主轧机、镀锌板生产线,详细了解了攀钢在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站在亚洲第一高坝—宏伟壮观的二滩大坝上,总书记对8年时间建成这座我国20世纪最大的水电站备感欣慰。他高度评价了二滩电站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按照国际惯例高标准、严要求地加强企业管理,不仅创下了大型建设项目不超投资预算的成绩,而且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可以告慰为三线企业的创立呕心沥血,奠定基石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关怀下,通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三线企业必定能够以雄健的姿态迈向新的世纪。

(责任编辑薛承)

①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从神秘走向辉煌——攀枝花开发建设史话》,红旗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第25页。